

刘 禾著

跨语际实践

—— 文学，民族文化与
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宋伟杰等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刘 禾著 跨语际实践

—— 文学，民族文化与
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宋伟杰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语时代：文学、电影文化与破碎今日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美)刘禾著 宋伟明等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6
ISBN 7-108-01629-X

I. ①跨… II. ①刘… III. ①英语-翻译理论
2)文化交融-语言-语言-中国-西方国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7232号

责任编辑 冯金-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6月北京第1版
200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 数 344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6.00元

序

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譬如,倘若不使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我们还能不能讨论——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跨越东西方界限的“现代性”问题?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由谁确定和操纵的?这些界限是否易于跨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普遍的或者非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信的比较范畴?

我在本书提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观点,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linguistic mediation forms)的可能性。虽然过去20年间,对后殖民性、文化、身份认同(identity)、自我与他者等问题的复杂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些研究也充分表明,如果继续将跨文化研究中具体的语言问题仅仅视为一种多余之物,或者仅仅视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果所进行的批判的一部分,将是不可思议的。后殖民理论家的著述令人振奋,而且他

们的研究方法所开启的意味深长的新思路使我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我本人关于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已使我必须直面种种现象与问题,它们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使我感到震惊的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恰恰是在批判西方统治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力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基本问题呢?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精心阐述的混杂性(hybridity)一词,旨在通过消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使后殖民的研究取向摆脱僵化的模式,从而能够把握各种复杂细微的差别。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国之外(diasporic)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欧洲宗主国语言被殖民地本土方言所污染而带有一种混杂性,而这些方言反过来又讽刺了殖民者语言假定的完整性。巴巴酷爱援引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笔下那个口吃的印度人西索迪亚(S. S. Sisodia),便精彩地道出了这一后殖民漫画像:“The troub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 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 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义。Rushdie, p. 343)。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欧洲宗主国语言并不通用,它们既不能与本土语言相匹敌,更无法获得民族语言或是方言的地位。那么,关于历史、能动作用、霸权、现代性以及主体性等问题,那些人民以及那些地区的经验,又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书使我有机会把语言实践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加以考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我们能以新的角度重新开启并追问西方统治与反帝斗争的意义。作为一名长在大陆,从小说写汉语,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中国人,我深深被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所吸引,尤其是汉语和英语、现代日语以及其他外国语言发生接触以来,其书面形式的变化。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通常是以日语为中介)之间广泛的接触/冲撞,特别关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1937 年)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及其早期的经典化过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然而,我对语言和文学的强调,并没有预先假定在表述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形而上的分裂。我要做的就是将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的民族建设及其关于“现代人”想像的/幻想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中介(agents)。

我在本书开篇处将“现代性”一词置于引号当中,并非心血来潮。我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早期的种种引证。这些引证的来源(origins)在数不胜数的重复、复述(evocations)、翻译以及再生产中消失殆尽。诚然,当我们说“modernity”或者“modern”在汉语中的等义词是现代性或者现代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哪一时刻,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这种等值

关系或者翻译才成为有意义的？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述行的/述愿的(performative/constative)叙事(比如说，经由特定情境的写作和言语而对某种观念不断的复述)乃是一些素材，它们构成了思想史家所理解的一个观念的“连续性”。举例说来，翻译行为必然要介入某种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之中，而这种语言限制着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或是为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所限制。对于诸如此类述行的/述愿的言语行为和写作行为(复述、翻译、语境内外的引证，等等)的环境而言，任何高高在上或者超越这些环境而进行的历史化尝试，注定会导致所分析的观念、概念或者理论的僵化，其结果也必定会导致我们对历史实践的理解的贫困化。因此，我对“现代性”的使用或者批判立足于一种引用的/翻译的研究取向。这样一种取向既考虑到现代性观念在较早些时候的复述，也考虑到我本人当下对这个观念的关注；即使我在本书中不再使用引号，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我就是用这个被人们反复引用和翻译的观念、这个可引用的(?)和可以互译的(?)的观念，来讨论中国现代的话语建构。

就这个方面而言，我对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如何想像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状况？以及从这一问题必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当某些类型的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得以合法化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如此，我关注的重心并不是中国现代的地方特性(the local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这一问题。倘若不充分研究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无法合理地得以探究或争论。当然，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观念是惟一可取的途径，人们可以对中国现代性提出许多其他的问题。

但就本书而言,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不致陷入以往那种对抗性范式的罗网。这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

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早已聚讼纷纭,广受质疑,而且本当如此。然而,仅仅因为它们是虚构的发明或人为的构造,就足以摒弃这一二元对立吗?我的观点是,更有效地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是要准确描述(无论何时存在可能)这样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在那些时刻,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在某种特定的语言中的使用开始具有语境的意义,并获得合法性。我之所以在本书中继续使用 East 与 West,是因为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这两个英文词在现代汉语中作为“东方”与“西方”的翻译表现(performance)。对现代翻译进行这样的研究使我能够质疑常识世界的**不证自明性**(皮埃尔·布迪厄语),而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正是以这种逻辑命名他们自身与任何一种偶然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的,这些身份认同被中国作家理解为在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存在,或是被外界强加于身上。换言之,我所关注的是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合法化过程、喻说(trope)以及叙事模式,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条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本书所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要想轻松自如地谈论中国化,必须充分假设中国自信其文明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具有绝对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在我所考察的这段时间里,由于西方的在场,这种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其程度之深,甚至迫使中国不再能为自身维系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而必须或隐或显地参照世界的其他地

方,后者时常以西方为代表。我也并非特别关注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的和普遍化的规划,诸如外国词语在任何一种语言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domestication),这是历史语言学家经常考虑的问题。我真正的理论兴趣在于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在这些符号意义介入的(mediated)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能动作用的暧昧性。因此,导言一章主要是批判地反思当代有关东方与西方、语言与权力、历史与变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的状况。毋庸赘言,我借助跨语际实践的观念,重新处理了比较文学、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至第九章分为三个部分,它们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分别考察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不同层面。第一部分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中由“民族”与“个人”这两个主导性关怀所描绘的话语疆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种特别突出的话语上:“国民性”理论与“个人主义”,每一种话语都是新的借贷词,来自日语对欧洲概念和理论的翻译。我认为,正是在这些被译介的理论和话语的疆界内,以及在对抗这一疆界的过程中,五四作家提出了他们关于现代性的基本主张。

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被误解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式的关键词研究,我愿意强调我的关注点不在于考察词语、概念以及话语的变化含义,据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由于我关注的焦点是汉语文学实践中“现代”的合法化过程,所以我也必然要思考跨语际的表述模式问题。举例说来,我对鲁迅《阿Q正传》的解读旨在理解,这篇小说是如何通过建构一种符号意义介入的叙事主体而挪用国民性

话语的。这一研究取向在第二部分得以进一步强调,因为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figures),如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transpositions)等。虽然大部分此类特征对中国文学来说显然是新颖的,并时常伴随着自封自命的与欧洲语言文学的亲 and 性,但是,仍旧存在许多其他特征,不能确凿无疑地回溯成外国影响的结果。举例说来,影响的观念所无法解释的那些剩余的意义是什么?有学者提供的似乎可行的诠释是,这些意义乃是转化成现代表达形式的传统感受力(sensibilities)。然而,一个随即产生的困境是,如何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线。

在分析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这一类有符号意义介入的表述形式的时候,我一直抵制着如下一种诱惑,即要么用外国影响要么用本土演进来解释变化,因为选择这一方式会过早地结束对问题的探讨,而实际上我们恰恰应当把它揭示出来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读者将会注意到,影响我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与读解正是受跨文化诠释这一主导性问题意识,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canon)本身。

诚然,经典本身也需要质疑。第三部分“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继续思索能动作用、中介与翻译的知识,但这一部分的探究方式是在经典的形成、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化建设的规划的范围里,着手处理合法化问题的。具体说来,我审视民国

时期现代文学批评的功能,并查考经典形成的环境,譬如1935至1936年间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过程。我特别感兴趣现代汉语文化诠释自身的转折点与展开方式时的形式,以及文学规划被个别作家与批评家相异的政治志向所左右的方式,尽管这些作家与批评家认为他们本身是在群策群力地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状况。也就是说,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矛盾状况促进了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步骤,即把中国文学与文化设想为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文学与文化中的一种。本书的最后一章重新思考有关国粹作为一种文化建设话语的论战。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一话语变化的动力引发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叙事与对抗性的话语,而这些叙事和话语将会无疑使我们对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与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之意义的理解变得复杂起来。

刘禾,199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2001年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Magistrett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现任密执根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Helmut F. Stern Professor)。1998—2000年任全美文学理论书奖(韦勒克奖)和文学史书奖(列文奖)两项大奖评委,现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董事。

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

英文学术著作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Token of Exchange*(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即将出版有*Semiotics of 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持灯的使者》(编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在人们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书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翻译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以期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苏秉琦著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吴承明著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 泉著

乐师与史官

阎步克著

圣灵降临的叙事（即出）

刘小枫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即出）

汪 晖著

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著

跨语际实践

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1900—1937）

刘禾著 宋伟杰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

目 录

序	1
---------	---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	1
-------------------------	---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5

翻译差异——一个矛盾形容法? 14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27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35

变化论,新词与话语史 38

I 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 国民性理论质疑	75
-------------------	----

国民性神话 76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79

翻译国民性 88

跨际写作的主体性:《阿Q正传》的叙述者 97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109
------------------	-----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110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123

II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现实主义问题 143

《骆驼祥子》 147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现实与梦想的争辩 182

重新勾画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184

梦幻的心理化 188

现实的万花筒 202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214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216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221

忏悔之音 234

说我是女人 244

III 民族建设与文化建设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263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266

性别与批评 279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生死场》 285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308

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文学 309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316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319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323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342
《国粹学报》	345
《学衡》	351
附 录	369
A. 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374
B. 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	388
C. 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	402
D. 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404
E. 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431
F. 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440
G. 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461
文献目录	464
编后记	504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

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之间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是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论“信”这一表示夫妻间关系式的喻说与“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某位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她)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这里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相互作用。^[1]我在着手处理本书的主题之前，就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更大的问题，如西方学术界在思考文化差异时表现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式。举例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2]使用谁